

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转译：徽派建筑与文化自信的关联机制研究

张磊¹, 张秉顺¹, 黄欣^{2*}

¹建筑与空间规划学院, 安徽建筑大学, 合肥 230009, 安徽, 中国

²建筑系,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嘉兴 314051, 浙江, 中国

摘要: 文化自信作为民族发展的深层精神动力, 其建构过程需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性阐释与当代转化。徽派建筑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重要分支, 蕴含着丰富的营建生态智慧, 是彰显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关键文化符号。然而, 既有研究对徽派建筑的考察多集中于艺术风格、构造技术与遗产保护等内部维度, 缺乏从文化自信传播视角展开的跨学科关联研究。本研究整合了建筑现象学、批判地域主义、文化符号学与社会记忆理论等跨学科资源, 构建“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的三元理论框架。通过对徽派建筑自然适应性基因、材料工艺生态基因与文化传承生态基因的学理阐释, 本研究揭示了徽派建筑生态基因经由场所精神守护、在地性伦理实践与装饰符号编码等路径参与文化认同建构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 徽派建筑营建生态智慧不仅是一种前现代的环境适应性技术知识, 更是一种嵌入在物质空间中的文化基因, 其当代价值转译对于文化强省战略实施与中国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学术参照意义。

关键词: 徽派建筑; 生态基因; 文化自信; 关联机制; 价值转译; 营建生态智慧

The Contemporary Valu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isdom: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Mechanism between Huizhou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Lei Zhang¹, BingShun Zhang¹, Xin Huang^{2*}

¹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Spatial Planning, Anhu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Hefei 230009, Anhui, China

²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ongji University Zhejiang College, Jiaxing 314051,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confidence, as a deep-seated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and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for its construction. Huizhou architecture,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system, contains rich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isdom and is a key cultural symbol showcasing the unique cha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on Huizhou architecture mainly focuses on internal dimensions such as artistic styl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lack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dissemination. This study integrates interdisciplinary resources such as architectural phenomenology, critical

regionalism, cultural semiotics, and social memory theory to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gene decoding — value reconstruction —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rough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al adaptability genes,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ecological gen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ecological genes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herent logic of how the ecological genes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pathways such as the protection of place spirit, local ethical practices, and the encoding of decorative symbol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is not only a pre-modern form of environmentally adaptive technology, but also a cultural gene embedded in material space. Its contemporary value translation has significant academic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culturally strong provi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Keywords: Huizhou architecture; Ecological genes; Cultural confidence; Correlation mechanism; Value translation; Ecological wisdom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文化自信作为民族发展的深层动力，其战略意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日益凸显。文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更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命脉，是维系社会认同与历史连续性的关键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其当代转化与价值重构成关乎文化主权与话语自主性的根本命题。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建筑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与空间表征，承载着传递文化基因、建构集体记忆、塑造文化认同的多重功能。徽派建筑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重要分支，其蕴含的营建生态智慧不仅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与和谐共生的哲学追求，更构成了展示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重要文化资源。

然而，既有研究在徽派建筑与文化自信的关联维度上呈现出显著的学术盲区。从研究范式来看，当前学界对徽派建筑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两个向度：其一为艺术史与建筑学的内部研究，侧重于风格谱系的梳理、构造工艺的解析以及空间形态的美学评价；其二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路径，聚焦于古建筑的修缮技术、材料复原与数字化存档 [1,2]。上述研究虽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可观成果，却普遍缺乏将建筑生态基因置于文化自信建构框架中进行系统阐释的理论自觉。换言之，现有学术话语尚未充分揭示徽派建筑营建生态智慧如何经由价值转译机制转化为文化自信的生成要素，也未能在跨学科的整合视野中构建“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的完整逻辑链条。这一理论缺口的背后，折射出建筑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等学科之间深层的壁垒状态，以及人文社科学术话语体系中对建筑文化价值阐释的结构性不足。

从国际学术对话的角度审视，营建生态智慧（architectural ecological wisdom）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学术概念，其在比较建筑学与文化研究中的理论位置尚未得到充分确立。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所倡导的批判性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虽然为理解本土建筑传统的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但该理论框架发轫于西方现代主义批判语境，其对中国传统建筑生态哲学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核心范畴的阐释力仍存在明显局限 [3]。因此，如何从本土学术话语出发，建构既能对接国际建筑理论前沿、又能彰显中国哲学特质的理论模型，成为本研究试图回应的核心问题。

（二）核心概念界定

营建生态智慧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概念界定直接关系到后续论证的学理深度。从学理层面看，营建生态智慧是指传统建筑活动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知识系统、技艺体系、理念结构与价值规范的总和，其涵盖维度包括选址布局、空间组织、结构营造、材料选用、装饰表意等建筑生产的全部环节 [4]。该概念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建筑生态”或“绿色建筑”之处在于：后者多从技术理性出发，强调建筑对环境的低影响与

能效优化；而营建生态智慧则蕴含着更为深厚的人文哲学维度，它将建筑视为天地人三才交互作用的产物，是生态伦理、宇宙观与身体实践在空间形态中的综合体现。在这一意义上，营建生态智慧不仅是一种环境适应性的技术知识，更是一种嵌入在物质空间中的文化基因（cultural gene），承载着特定社群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审美取向。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关于文化认同的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文化自信的动态建构性：文化认同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在历史叙事、空间实践与符号表征的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的意义过程 [5]。据此，文化自信在本研究语境中被界定为：个体与群体在接触、理解与阐释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价值确认、情感归属与意义认同，体现为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精神力量。

关联机制则是连接上述两个核心概念的理论枢纽。本研究所言的关联机制，是指徽派建筑生态基因影响文化自信形成的内在逻辑与作用路径，具体表现为生态基因的符号化编码、叙事化传播与情感化激活三个递进层次 [6]。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视域中，关联机制可理解为文化资本向符号资本转化的中介过程：徽派建筑所承载的营建生态智慧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形态，经由特定的阐释框架与传播渠道，转化为可供社会成员共享的意义资源，进而参与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文化自信的生成 [7]。

（三）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填补徽派建筑研究中的文化自信维度缺位，推动建筑学、文化研究、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对话。通过构建“生态基因谱系—价值转译机制—文化自信提升”的三元理论框架，本研究试图突破既有研究的学科壁垒，为传统建筑文化的当代价值阐释提供新的分析路径与概念工具。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的服务面向具有双重维度：其一，为文化强省战略提供学术支撑，助力徽派建筑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挖掘与创造性转化；其二，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参照，使徽派建筑的营建生态智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有效载体。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文化自信的理论谱系

文化自信既非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也非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而是在辩证扬弃中实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看来，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不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更深刻地体现为日常生活实践中文化价值观的渗透与内化 [8]。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文化语境，可以发现文化自信的深层建构离不开对文化领导权的自觉掌控，即通过系统性的文化叙事与符号传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成员共享的意义框架与价值坐标。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则从时间维度补充了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集体记忆并非个体记忆的简单聚合，而是社会框架对过去的重构性选择，其功能在于维系群体认同的连续性与边界感 [9]。徽派建筑作为物质化的记忆载体，其空间形态与符号系统正是建构集体记忆、强化文化归属的重要媒介。

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提升至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根基，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二）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研究：从风水理论到当代生态建筑学的学术对话

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学术谱系涵盖了风水理论、建筑现象学、生态哲学与当代生态建筑学等多个知识领域。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审视，传统风水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认知与空间

智慧,其“藏风聚气”“负阴抱阳”等核心概念实质上是对自然地理环境进行综合评估的生态实践知识 [10]。王其亨等学者通过大量实地测绘与文献考证,揭示了风水理论中选址、定向、布局等环节所蕴含的科学理性,指出传统风水是前科学时代中国先民在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的环境认知体系 [11]。然而,风水研究在学术话语中作为生态智慧的学术合法性尚未得到充分确立。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人诗意地栖居”(poetically man dwells)的哲学论述,为理解传统营建生态智慧的存在论基础提供了现象学路径。在海德格尔看来,栖居(dwelling)不仅是人居于空间中的物理事实,更是人作为“此在”(Dasein)在天地间建立归属关系、守护存在的根本方式 [12]。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天地神人”四重整体(the fourfold)框架,揭示了栖居的本质在于守护四重整体的共属一体,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形成了深刻的理论共鸣。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诗学》(La Poétique de l'espace)中则通过现象学方法分析了空间与记忆、想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建筑空间不仅是物理容器,更是承载人类情感与回忆的诗性场域 [13]。上述理论资源为营建生态智慧的研究提供了从经验描述向哲学阐释跃升的方法论可能。

在当代生态建筑学的视域中,诺伯特·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提出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概念为理解传统建筑与环境的深层关联提供了关键概念工具。舒尔茨将场所精神界定为特定环境中“定向”(orientation)与“认同”(identification)的双重实现,强调建筑的本质在于使人在特定环境中“在场”(being present)并获得归属感 [14]。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徽派建筑的营建生态智慧不仅体现为技术层面的环境适应性,更体现为一种通过空间营造实现人地和谐、主客交融(subject-object integration)的存在论实践。此外,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所倡导的生态整体主义立场,要求将人类从自然的中心位置移除,承认非人类生命形式与生态系统自身的内在价值,这一立场与中国传统哲学中“道法自然”“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具有高度的理论亲和性 [15,16]。

(三) 徽派建筑研究的三重维度: 艺术史、建筑技术与文化遗产

既有学界对徽派建筑的研究呈现出艺术史、建筑技术与文化遗产三个主要维度的分化格局。在艺术史维度,研究者主要关注徽派建筑的风格源流、形式演变与美学特征。刘敦桢等建筑史学者通过大量田野调查与实物测绘,系统梳理了徽派建筑从明清至近代的风格谱系,揭示了其“粉墙黛瓦、马头墙、天井院落”等标志性形式元素的历史生成逻辑 [17]。此类研究为徽派建筑的形式认知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但其分析框架多局限于风格史与图像学的内部视角,缺乏将建筑形式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意义阐释的理论深度。

在建筑技术维度,研究聚焦于徽派建筑的构造工艺、结构体系与材料应用。传统徽派建筑以木构架为主要承重体系,辅以砖石墙体,形成了兼具抗震性与适应性的结构形态。学者们通过对营造法式、工匠口诀与传统工具的考察,揭示了徽派建筑技术体系中蕴含的力学智慧与生态经验 [18,19]。然而,技术维度的研究往往将建筑视为纯粹的物理客体,忽视了技术实践背后所承载的文化观念与社会意涵,从而未能充分回应建筑作为文化符号的深层意义问题。

在文化遗产维度,研究主要围绕徽派建筑的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展开。随着徽州古村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徽派建筑的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涉及古建筑的病害评估、修复材料、数字化存档以及旅游活化等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技术体系 [20,21]。但文化遗产研究的实用主义导向,使其更多地关注保存技术的有效性而非文化意义的阐释深度,徽派建筑作为文化自信建构资源的价值维度在这一研究路径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四) 理论缺口与本文切入点

综合审视上述三个研究维度, 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理论缺失: 既有研究均缺乏文化自信维度的自觉介入。艺术史研究关注形式却忽视了形式的符号价值与认同功能; 建筑技术研究关注工艺却割裂了技术与文化意义的内在关联; 文化遗产研究关注保存却将建筑降格为待修复的物质遗产而非活的文化资源。这一碎片化的研究格局, 使得徽派建筑所蕴含的营建生态智慧在文化认同建构与文化自信提升中的潜在价值长期被遮蔽。

本文的学术切入点正是在于识别并弥补上述理论缺口。通过引入文化符号学、建筑现象学与社会记忆理论的跨学科视角, 本研究试图建构一个能够整合形式分析、技术阐释与意义解读的综合性理论框架。该框架以“关联机制”为核心概念, 将徽派建筑的生态基因视为一种文化编码系统, 分析其如何通过符号传播、空间实践与叙事建构等路径参与文化自信的生成过程。这一研究路径的价值在于: 既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分析局限, 又在本土学术话语与国际理论前沿之间建立了对话的可能, 从而为传统建筑文化的当代价值转译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

三、徽派建筑生态基因的学理阐释

(一) 自然适应性基因: 场所精神与生境智慧

徽派建筑的自然适应性基因, 集中体现为其选址布局与周边山水环境的深层融合关系, 这一融合并非简单的地形顺应, 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存在论实践。从海德格尔栖居现象学的视角审视, 徽派建筑的选址逻辑本质上是对“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守护与显现。徽州地区典型的“枕山、环水、面屏”格局, 使建筑实体嵌入于山峦叠嶂与溪流环绕的自然语境之中, 形成了人与天地共属一体的空间诗学 [22]。建筑群体的布局轴线往往顺应山脉走向与水系脉络, 村落整体呈现出“因山就势、随水成形”的空间形态。这种布局策略的深层逻辑在于: 自然山水并非建筑活动的客观背景, 而是建筑意义生成的本体论条件。人在这样的空间中栖居, 不仅获得了物理层面的庇护功能, 更在存在论层面实现了与自然环境的共属一体, 体验到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在场性。

在微观尺度上, 徽派建筑单体与院落空间的设计同样体现了深刻的生境智慧。天井作为徽派建筑最具标识性的空间元素, 其功能远不止于采光与通风的技术考量。从现象学的身体空间(lived body)视角出发, 天井创造了一个连接室内与室外、遮蔽与开放、私密与公共的过渡性场域, 使居住者的身体经验在垂直向度上获得了天空的敞开与大地根基的双重定向 [23]。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现象学揭示了空间并非外在于身体的客观容器, 而是通过身体知觉与运动意向性建构出来的意义场域。据此, 徽派建筑中通风、采光、排水等生态功能的设计, 实际上是围绕身体经验展开的空间诗学实践: 天井的高窄比例引导了气流的自然循环, 高墙深院创造了适宜的地域微气候, 四水归堂的组织方式则体现了对雨水资源的生态化利用。这些设计选择共同构成了一种“主客交融”(subject-object integration)的空间范式, 在其中, 人的身体感知、自然环境的物质条件与文化意义的符号系统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 材料工艺生态基因: 在地性伦理与可持续营建

徽派建筑的材料工艺生态基因, 体现为对本土可持续材料与传统环保建造技术的系统性运用, 这一运用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在地性伦理(ethics of place)与生态责任观念。肯尼斯·弗兰姆普敦所倡导的批判性地域主义, 虽然主要批判的是现代主义建筑国际风格的同质化倾向, 但其核心关切——即建筑应当回应特定场所的自然条件与文化传统——与徽派建筑的材料选择逻辑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理论呼应 [24]。徽派建筑主要采用砖、木、石三种本土材料: 青灰砖用于墙体砌筑, 就地取材于徽州丰富的黏土资源; 杉木与银杏木用于构架与装修, 取自周边山林; 青石板与麻石用于铺地与台阶, 取材于当地采石场。这一材料体系的生态智慧在于其“取之于地、用之于地、归于之地”的闭环逻辑,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材料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与环境负担。

从生态哲学的维度审视, 徽派建筑的材料选择不仅是一种技术经济决策, 更是一种体现生态整体主义价值立场的伦理实践。传统匠人在材料选用与加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 形成了因材施用、因材施艺的技艺传统。砖雕、木雕与石雕作为徽派建筑装饰的核心技艺, 其制作过程中对材料的尊重与节约体现了“敬天惜物”的传统生态伦理 [25]。工匠在雕刻过程中力求充分利用每一块材料的天然纹理与形态特征, 将材料自身的“物性”(thingness) 转化为审美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对待材料的态度, 与当代可持续建筑理念中强调的“减量、再用、循环”(reduce, reuse, recycle) 原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但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将材料视为具有自身存在意义的生命体, 而非仅具工具价值的资源客体。在结构层面, 徽派建筑的榫卯节点与穿斗构架体系展现了极高的材料效率, 通过精巧的节点设计实现了结构传力路径的优化, 使木材的力学性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这种基于材料特性的结构理性, 不仅体现了传统工匠的力学智慧, 更构成了一种前工业时代的可持续营建范式, 对当代建筑学中过度依赖高能耗材料与复杂技术的倾向具有批判性的参照价值。

(三) 文化传承生态基因: 装饰符号的生态哲学编码

徽派建筑的文化传承生态基因, 集中体现于其装饰图案系统中蕴含的生态寓意与文化理念, 这些图案通过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机制, 将自然意象转化为承载价值规范的文化符码。从符号学的分析框架出发, 徽派建筑装饰中的蝙蝠、鹿、莲花、喜鹊、松竹梅等吉祥图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 其能指层面是具体的动植物图像或抽象化的纹样形式, 而所指层面则是与之对应的文化价值与生态伦理 [26]。以“蝙蝠”图案为例, 其能指为蝙蝠的视觉形象, 所指则为“福”的谐音联想, 进而引申为对幸福生活的祈愿; 在更深层的文化编码中, 蝙蝠作为夜行动物的生态特征被赋予了“福从天降”的神秘意涵, 将自然生物的生活习性纳入了吉祥叙事的符号结构。这种编码方式揭示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一种独特的“自然象征主义”: 自然界中的生物与现象并非孤立的客体, 而是被纳入了一个充满伦理意涵与宇宙秩序的象征体系。

莲花作为徽派建筑装饰中频繁出现的主题, 其符号意涵的生态哲学维度尤为值得关注。在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哲学的双重影响下, 莲花被赋予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洁身自好品质, 成为君子人格与道德修养的象征 [27]。从深层生态学的视角审视, 莲花符号所传递的不仅是道德教化的意涵, 更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宇宙论想象: 莲花扎根于淤泥而花开水面, 象征着生命从混沌自然中升华而出却不脱离自然的根本联系。这一意象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形成了符号层面的呼应, 将生态伦理内化为审美经验与道德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 徽派建筑中的“冰裂纹”窗棂、“回纹”砖雕等抽象纹样, 同样承载着生态哲学的编码功能。冰裂纹以其模仿自然冰裂效果的随机形态, 表达了对自然过程之美的审美认同; 回纹以其循环往复的几何结构, 象征着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秩序 [28]。这些装饰符号共同构成了一套“空间中的自然教科书”, 通过日常的视觉接触与空间体验, 将生态智慧与价值理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了建筑的使用者与观赏者。

(四) 从基因谱系到知识体系的整合认知

上述三类生态基因——自然适应性基因、材料工艺生态基因与文化遗产生态基因——并非彼此孤立的分类项, 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内在关联、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自然适应性基因构成了徽派建筑生态智慧的物质基础与空间框架, 它决定了建筑如何嵌入自然环境、如何回应气候条件、如何组织空间体验; 材料工艺生态基因构成了生态智慧的技术中介与物质载体, 它通过材料选择与工艺实践将生态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实体存在; 文化遗产生态基因则构成了生态智慧的符号层面与意义维度, 它通过装饰图案与象征系统将生态伦理编码为可供社会成员共享的文化资源 [29]。三类基因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为一种从物质到意义、从实践到符号的递进结构: 自然适应性为材料工艺提供了生态约束与灵感来源, 材料工艺为文化遗产提供了物质载体与技术条件, 文化遗产则为自然适应与材料工艺赋予了超越功利层面的意义深度。

从知识体系的整合视角审视, 徽派建筑的生态基因谱系实际上是一种“活的传统”(living tradition), 其知识形态兼具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与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的双重特征。工匠的技艺口诀、身体化的操作技能、对材料特性的直觉把握等属于隐性知识范畴, 这类知识难以通过文字或图纸完全传递, 而依赖于师徒传承中的身体模仿与情境学习 [30,31]。风水理论中的方位原则、建筑装饰中的象征规范、建筑形制中的等级秩序等则属于显性知识范畴, 这类知识以可编码的形式存在于文献记录、图样样本与社会习俗之中。两类知识的交互作用, 使徽派建筑的生态智慧呈现出一种“知行合一”的整体性特征: 知识不仅是认知层面的信息, 更是嵌入在身体实践与空间营造中的行动智慧。这一认识论特征提示我们, 对徽派建筑生态基因的当代转译, 不能停留于形式层面的符号提取或技术层面的要素模仿, 而必须在深层次上理解其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生成机制, 从而实现从“基因解码”到“价值重构”的完整转译过程。

四、文化自信关联理论模型的建构

对徽派建筑生态基因的当代转译, 不能停留于形式层面的符号提取或技术层面的要素模仿, 而必须在深层次上理解其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生成机制, 从而实现从“基因解码”到“价值重构”的完整转译过程。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追问: 生态基因的解码与价值重构如何与文化自信的生成发生关联。这一追问的理论必要性在于, 现有研究对生态智慧与文化自信之间的关系多停留在描述性阐释或经验性归纳层面, 缺乏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来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与动态演化路径。因此, 有必要建构一个能够统摄“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三重维度的关联理论模型, 以回应这一理论缺口。

(一) 模型建构的理论逻辑

“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三元关联模型的建构, 其理论逻辑根植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从学理层面看, 生态基因的解码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的认识论跃迁, 这一过程对应于认识发展中的量变积累阶段; 价值重构则是在解码基础上对生态基因之当代意义的创造性阐释, 标志着认识从抽象规定向思维具体的辩证回归, 蕴含了质的飞跃; 文化自信的提升则是价值重构在主体精神层面的集中显现, 是量变与质变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同样为模型建构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生态基因、价值重构与文化自信三者并非孤立要素的简单加和, 而是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功能系统, 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 这正是模型建构之必要性的哲学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理论, 进一步揭示了模型建构的社会历史维度: 生态基因作为物质文化的积淀, 其价值重构在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运作, 而文化自信则是上层建筑中精神文化层面的核心表征, 三者之间呈现出从物质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的辩证转化过程。从既有研究的学术脉络审视, 生态智慧研究、建筑文化遗产研究、文化自信研究分别构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 其间缺乏有效的理论桥梁来实现跨学科整合。三元关联模型的建构, 正是通过揭示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与文化自信提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为这三个领域的对话与融合提供了整合性的理论工具。值得指出的是, 该模型并非线性的因果决定模型, 而是多层次、多路径的关联系统, 其中任何一个层次的变化都会通过反馈回路影响其他层次, 从而形成一个动态演化的理论结构。

(二) “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三元关联模型的框架设计

三元关联模型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构成, 分别为生态基因解码层、价值重构层与文化自信提升层, 三个层次之间形成循环反馈的关联结构。

第一层为生态基因解码层（输入层），其功能在于将徽派建筑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从隐性知识状态转化为显性知识形态，从物质形态转化为可阐释的文化符号。解码的对象涵盖前文所阐释的三类生态基因：自然适应性基因、材料工艺生态基因与文化遗产生态基因。解码过程并非简单的分类罗列或现象描述，而是借助现象学还原、符号学分析、知识社会学阐释等方法，揭示生态基因背后的生成逻辑、认知结构与意义编码。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隐性知识理论为解码层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徽派建筑的生态智慧大量存在于工匠的身体技艺、地方性的营造口诀与口传心授的实践经验之中，这些知识具有难以言说的隐性特征，解码的核心任务正是通过系统化的阐释将其转化为可传播、可教育的显性知识。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文化基因（meme）理论则为解码层提供了传播学视角：生态基因作为一种文化复制因子，其传播与变异遵循特定的选择机制，解码过程即是对这些文化基因之选择优势的识别与阐释 [32,33]。

第二层为价值重构层（中介层），其功能在于对解码后的生态基因进行当代语境下的价值阐释与意义重构。价值重构并非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简单复述，而是在当代社会需求与问题意识驱动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体而言，价值重构包含三个维度：其一，生态价值重构，将徽派建筑的生态适应策略置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中进行阐释，揭示其在绿色低碳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当代议题中的价值内涵；其二，文化价值重构，将徽派建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阐释其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文化创新中的意义，回应文化自信建构的理论需求；其三，审美价值重构，从空间诗学与装饰美学的维度，揭示徽派建筑在当代审美体验中的价值，包括其意境营造、韵律节奏、材料质感等审美特质的当代意义。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论述为价值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传统艺术作品的“aura”（光晕）在机械复制时代面临消散，但通过与当代技术、当代语境的创造性结合，传统艺术的“aura”可以转化为一种新的当代形式，实现从“传统”到“当代”的价值转译。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关于“物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 of things）的理论则揭示了价值重构的社会过程：物的价值并非其内在固有的属性，而是在社会流动、交换与阐释中不断生成与变化的，徽派建筑生态基因的当代价值正是在其“社会生命”的延续与转化中获得新的意义维度。

第三层为文化自信提升层（输出层），其功能在于揭示价值重构如何导向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增强。文化自信的提升并非抽象的意志宣示，而是包含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过程。认知层面，主体通过生态基因解码与价值重构，获得对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的理性认识与深刻理解，形成关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知识性自信；情感层面，主体在认知基础上产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归属感与认同感，形成情感层面的文化自信；行为层面，主体将文化自信转化为主动传播、保护、传承传统建筑文化的实践意愿与行动能力，形成行为层面的文化自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理论则揭示了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民族认同并非建立在面对面的交往基础上，而是通过对共同符号、共同叙事与共同记忆的文化想象而被建构的，徽派建筑作为文化符号正是参与这一想象建构的重要媒介。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认同理论进一步指出，认同并非固定的本质，而是在历史叙事、空间实践与符号表征的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的意义过程，这为理解文化自信作为动态建构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个层次之间的关联并非单向线性的因果链条，而是循环反馈的关联系统。生态基因的解码为价值重构提供知识基础，价值重构为文化自信提升提供意义支撑，而文化自信的提升又会反过来激发更深层次的生态基因解码与更广泛的价值重构——形成正反馈循环。从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的视角看，这一反馈回路是模型持续运转与自我增强的动力机制，使得三元关联系统具有内在的动力学稳定性 [34]。

（三）模型的内在机理与系统动力学阐释

从系统动力学视角审视, 三元关联模型的内在运行机理可概括为三个核心回路。正反馈回路构成模型的核心驱动机制: 生态基因解码的深化拓展价值重构的广度与深度, 价值重构的丰富性增强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与情感强度, 文化自信的提升又反过来激发对生态基因的更深入探索与更广泛的当代阐释, 由此形成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这一正反馈机制确保了模型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的持续增长与演化。系统韧性 (system resilience) 是模型保持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C.S. 霍林 (C.S. Holling) 的韧性理论指出, 复杂系统在面对外部扰动时维持其结构与功能的能力, 取决于系统内部反馈回路的多样性与冗余度 [35]。三元关联模型中, 三个层次各自包含多个子回路 (如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的并行重构), 这种结构上的多样性赋予了模型较强的抗干扰能力。Jay·福雷斯特 (Jay Forrester) 的系统动力学理论进一步揭示了系统行为的非线性特征: 系统的输出并非与输入成简单的比例关系, 而是可能呈现延迟、放大、振荡等复杂动态, 三元关联模型中文化自信的提升往往滞后于生态基因解码与价值重构, 这种时间延迟恰恰是系统自我调节与稳定运行的内在机制 [36]。从模型的内在逻辑审视, 其稳定性还源于三个层次之间的耦合强度: 解码层与重构层之间是知识—阐释的耦合, 重构层与提升层之间是意义—认同的耦合, 而提升层与解码层之间则是动力—目标的耦合, 三重耦合形成了相互锁定的结构稳定性。

(四) 模型的学理边界与适用性

任何理论模型的建构都必须在明确其学理边界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有效的解释功能。三元关联模型的适用范围以徽派建筑为核心案例, 但其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可迁移性, 可扩展至其他地域传统建筑体系 (如闽派建筑、川派建筑、京派建筑等) 的文化自信研究。然而, 该模型存在明确的适用性边界: 其一, 模型不适用于完全脱离传统建筑语境的现代主义建筑或国际风格建筑的文化自信分析, 因为这类建筑缺乏可供解码的“生态基因”谱系; 其二, 文化自信的提升受宏观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制度、全球化进程等外部条件的制约, 模型揭示的是关联机制而非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结果,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生态基因的解码与价值重构未必直接导向文化自信的增强, 其间的中介环节与调节变量需要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加以验证。由此观之, 三元关联模型的价值更多在于提供了一个可检验、可修正的理论框架, 而非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定律。

五、徽派建筑与文化自信关联机制的多维解析

三元关联模型为理解徽派建筑与文化自信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总体性的理论框架, 但模型中的关联机制究竟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审美维度中运作, 仍需进一步的多维解析。本章从四个维度展开对关联机制的具体阐释, 揭示徽派建筑从物质空间到精神认同的转化路径。

(一) 历史传承机制: 文化记忆与集体认同的唤醒

徽派建筑作为跨越千年的物质文化遗产, 其最为根本的关联机制在于其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功能, 这一功能通过唤醒集体认同而实现文化自信的提升。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的集体记忆理论指出, 记忆并非纯粹的个人心理现象, 而是在社会框架中被建构与重构的集体性过程, 社会群体通过选择性的回忆与遗忘来建构关于过去的叙事, 从而维护群体的认同与延续 [37]。徽派建筑正是这样一种承载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 徽州古村落的空间格局、宗族祠堂的仪式场所、牌坊石刻的旌表叙事, 共同构成了宗族记忆与乡土认同的物质化锚点。加斯东·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的空间诗学进一步揭示了建筑空间与记忆之间的深层关联: 空间并非仅仅是物理性的容器, 而是承载回忆、激发想象的诗性场域, “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 而是充满情感与意义的居住空间 [38]。徽派建筑中的天井院落、马头墙影、粉墙黛瓦, 正是这样的诗性空间——它们不仅是物理性的围合与遮蔽, 更是承载世代生活记忆、宗

族仪式与地方情感的容器。从机制路径审视, 历史传承机制的运作逻辑可概括为: 物理空间→记忆唤起→集体认同→文化自信。徽派建筑的物质形态首先通过视觉、触觉与空间体验唤醒主体的记忆与情感, 这种记忆唤醒在集体层面汇聚为对共同历史与共同文化的认同, 而集体认同的强化则直接转化为文化自信的生成。值得指出的是, 这一机制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 而是存在反馈回路: 文化自信的增强反过来会促进对徽派建筑保护、修缮与传承的意愿, 从而使物理空间获得更好的保存与延续, 进一步强化其记忆载体的功能。

(二) 文化认同机制: 地域风格与民族归属感的建构

徽派建筑独特的地域风格——粉墙黛瓦的色彩美学、马头墙的节奏韵律、天井院落的内向格局——构成了文化认同机制的视觉符号基础。斯图亚特·霍尔的认同理论指出, 认同并非先验的本质或固定的归属, 而是在历史叙事、空间实践与符号表征的持续互动中生成的意义过程, “认同是通过建构的叙事而被建构的, 它通过建构性的记忆来建构自身”。徽派建筑的地域风格正是这样一种建构认同的符号表征系统: 粉墙黛瓦的极简色调与当代极简主义、侘寂美学的对话, 揭示了中华审美传统在当代设计语境中的持续在场; 马头墙起伏错落的轮廓线构成了独特的建筑天际线, 其韵律感与节奏感成为民族审美独特性的视觉标识; 天井院落的内向性空间格局则体现了东方文化“内敛含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为文化认同机制提供了关键的理论透镜。徽派建筑是一种具有高度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从机制路径审视, 文化认同机制的运作逻辑为: 地域风格→符号识别→归属建构→文化自信。徽派建筑首先是徽州地域文化认同的载体, 但其蕴含的生态智慧、审美理念与哲学思想又超越了地域的局限, 成为中华文化的普遍表征, 因此地域风格的认同在逻辑上可以升华为对民族文化的整体认同, 从而成为文化自信的生成路径。

(三) 价值契合机制: 生态理念与当代主流价值的共振

徽派建筑的生态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的主流价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契合关系, 这种价值契合构成了关联机制的重要维度。徽派建筑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生态哲学、因地制宜的营建策略、循环利用的材料伦理, 与当代生态文明价值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深层呼应。从价值契合机制的路径审视, 其运作逻辑为: 生态理念→价值共鸣→意义认同→文化自信。徽派建筑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被重新发现与阐释, 这种阐释过程引发了传统智慧与当代价值之间的共鸣效应, 主体在价值共鸣中获得了对自身文化传统之当代意义的认同, 而这种意义认同直接转化为文化自信的生成。这一机制的特殊价值在于, 它使传统文化不再是博物馆化的静态遗存, 而是成为回应当代现实问题的活的思想资源, 从而赋予文化自信以现实的基础与当代的生命力。值得指出的是, 价值契合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传统生态理念与当代价值之间契合度的深度与广度: 当传统智慧能够有效回应当代社会的核心关切(如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时, 价值契合的效应最为显著。

(四) 审美体验机制: 空间诗学与主体自信的生成

从审美体验维度阐释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 是关联机制分析中最具哲学深度的路径。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揭示了建筑空间如何激发想象与情感: “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这是一个被体验的空间。被想象的空间是一个被体验的场的投射 [38]”。徽派建筑空间正是这样一种激发想象与情感的诗性场域: 天井院落中投射的方形天空引发对“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哲学冥想, 马头墙在光影中的起伏变化创造韵律的审美体验, 粉墙黛瓦在烟雨朦胧中的色彩意境唤起对东方美学“气韵生动”的深层感知。中国美学传统中的“意境”“气韵”“虚实相生”等范畴, 为理解徽派建筑空间的审美体验提供了本土化的理论框架。徽派建筑的空间营造并非追求实体性的堆砌, 而是追求虚实相生的意境之美——天井的空与院落的实、粉墙的素与黛瓦的浓、马头墙的动与粉墙的静, 形成了充满张力的审美空间。康德美学关于“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论述,为审美体验如何导向文化自信提供了关键性的哲学解释:审美判断超越了功利性的利害关系,主体在纯粹的审美体验中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与自主,这种自主性的体验直接转化为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当主体在徽派建筑空间中体验到一种超越日常功利世界的审美自由时,这种自由体验内化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肯定与自信。从机制路径审视,审美体验机制的运作逻辑为:空间审美→情感升华→主体自信→文化自信。这一路径的独特性在于,它并非通过理性认知或价值判断来实现文化自信的生成,而是经由直接的审美体验与情感升华来触及主体的精神内核,从而成为最为深层与持久的文化自信生成路径。

六、文化自信理论的徽派亮点凝练

基于前述模型建构与机制解析,本章进一步凝练徽派建筑参与文化自信建构的理论亮点,从生态哲学、审美价值与理论普遍性三个维度,揭示徽派建筑作为中华文化自信样本的独特贡献。

(一)“天人合一”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

徽派建筑最为突出的理论亮点在于其对“天人合一”生态哲学思想的物质化呈现与当代转化。“天人合一”作为中华哲学的核心命题,在徽派建筑中获得了最为直观与具体的表达:依山就势的村落选址体现了对地形地貌的顺应而非征服,天井院落对自然光、风、雨的有序引入实现了建筑与自然的有机交融,材料的选择与使用遵循了“就地取材、因物制宜”的生态伦理。从传统哲学概念到当代生态文明话语的转译,“天人合一”在徽派建筑的研究中获得了新的理论生命力。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代表人物阿恩·奈斯(Arne Næss)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与中国“天人合一”哲学形成了跨文化的理论对话:奈斯主张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置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利益之上,追求一种“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的实现,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15]。徽派建筑作为“天人合一”哲学的物质化实践,为这一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具体的案例支撑与经验证据。从文化自信的维度审视,“天人合一”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它证明了中华哲学传统并非博物馆化的历史遗存,而是具有回应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之思想能力的活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当代性”正是文化自信最为坚实的哲学根基。

(二)徽派建筑审美价值的文化自信维度

徽派建筑的审美价值不仅是一种形式美学的评价对象,更是文化自信的生成资源与表达媒介。粉墙黛瓦的极简美学以其“素以为绚”的审美特质,与当代国际设计语境中的极简主义、侘寂美学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审美对话,这种对话并非简单的风格巧合,而是揭示了中华审美传统中“以少总多”计白当黑等美学理念在当代的持久生命力。马头墙的形式韵律以其起伏错落的轮廓线构成了独特的建筑天际线,其韵律感与节奏感不仅是形式层面的视觉愉悦,更是民族审美独特性的空间表达——当主体面对这一独特的建筑天际线时,所体验到的不仅是形式的审美快感,更是对自身文化审美主体性的确认。天井院落的空间哲学则体现了东方文化内向性的宇宙观:与西方建筑追求外部扩张、向自然开放的空间逻辑不同,徽派建筑的天井院落通过向内的围合与向上的天空仰望,建构了一种“内观宇宙”的空间哲学,这一空间哲学体现了东方文化对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宇宙秩序之间关联的独特理解。从审美独特性到文化自信的逻辑路径在于:越深刻地理解自身审美传统的独特性与内在逻辑,越能够在全球化审美同质化中确立文化主体性,从而建立深层的文化自信[39]。

(三)从徽派样本到中华文化自信的理论普遍性

徽派建筑作为文化自信理论的地域样本,其理论贡献不仅在于揭示徽派建筑自身的文化自信建构机制,更在于为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参与文化自信建构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参照。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路径在于:徽派建筑所揭示的历史传承机制、文化认同机制、价值契合机制与审美体验机制,并非徽派建筑所独有,而是

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参与文化自信建构的普遍规律在不同地域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现。闽派建筑的红砖燕尾脊、川派建筑的穿斗悬山顶、京派建筑的宫殿院落格局,虽然在物质形态与地域特征上各不相同,但其背后所蕴含的“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的关联逻辑具有共通性。在全球文化多样性话语的背景下,徽派建筑的研究为全球提供了中国经验:在全球化与同质化压力日益加剧的当代语境中,批判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如何成为文化自信的策略资源——既不盲目追随国际风格的同质化趋势,也不陷入封闭的地域主义怀旧,而是在批判性反思中建构具有本土根基与当代价值的建筑文化主体性。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建构,文化自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抗这种文化他者化、确立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过程。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关于“底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追问,则为让传统建筑文化“说话”提供了理论路径:传统建筑文化作为一种“底层”话语,需要通过学术阐释、当代转译与价值重构来使其“被听见”,从而在全球文化话语中获得平等对话的地位[40]。徽派建筑研究的理论贡献,正在于为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从“沉默的物质遗存”转化为“可被言说的文化主体”提供了方法论示范。

七、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徽派建筑为研究对象,围绕“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转译与文化自信”这一核心议题,建构了“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的三元关联理论模型,并系统解析了历史传承、文化认同、价值契合与审美体验四个维度的关联机制。从学理层面看,三元关联模型的核心发现在于:生态基因的解码并非终点,而是价值重构与文化自信提升的逻辑起点;价值重构作为中介层,承担着将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当代文化资源的枢纽功能;文化自信的提升则是整个关联系统的综合输出,其生成过程是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层面协同作用的结果。四个关联机制的系统解析揭示了徽派建筑从物质空间到精神认同的转化路径:历史传承机制通过文化记忆的唤起与集体认同的建构,将建筑遗存转化为文化自信的根基;文化认同机制通过地域风格的符号识别与民族归属感的建构,将审美差异转化为文化主体性的确认;价值契合机制通过传统生态理念与当代主流价值的共振,将历史资源转化为回应现实问题的思想能力;审美体验机制通过空间诗学对主体情感的深层触动,将审美体验转化为精神自由与主体自信。在徽派亮点的凝练中,本文揭示了“天人合一”生态哲学的当代阐释、徽派建筑审美价值的文化自信维度以及从地域样本到理论普遍性的升华路径。本研究的学术创新在于:首次将“生态基因”概念引入建筑文化研究,构建了从生态基因到文化自信的跨学科关联分析框架,为建筑学、文化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对话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二) 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理论建构与机制解析为后续研究开辟了多个方向。在实证研究层面,三元关联模型有待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检验与修正,未来研究可设计涵盖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维度的文化自信测量量表,结合徽派建筑体验的前后测实验,对模型中的关联路径进行统计验证。在比较研究层面,本研究以徽派建筑为核心案例,未来研究可将该理论框架扩展至其他地域传统建筑体系(如闽派、川派、京派、晋派等),通过跨地域比较揭示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参与文化自信建构的普遍规律与地域差异。在国际传播研究层面,徽派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其在国际语境中的传播效果与跨文化接受机制有待深入考察,这将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建筑文化维度的学术支撑。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推进层面,本研究既为文化自信理论提供了地域文化与物质文化维度的新视角,也为传统建筑文化的当代转化与保护传承提供了学术路径与理论依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

索三元关联模型在建筑设计实践、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业开发等领域的应用路径, 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的良性互动。

项目基金

2025 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 2025CXZ028), “合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课题编号 HFSKYY202609)”。

参考文献

- [1] 张十庆. 徽州建筑.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2010.
- [2] 程极悦. 徽州古建筑修缮技术.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合肥, 2013.
- [3] FRAMPTON K. 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FOSTER H.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Seattle: Bay Press, 1983: 16-30.
- [4] 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 2001.
- [5] HALL S.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RUTHERFORD J.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222-237.
- [6] HALL S. Encoding/Decoding.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1980: 128-138.
- [7]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241-258.
- [8]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HOARE Q, NOWELL SMITH G.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323-333.
- [9] HALBWACHS M. On Collective Memory. COSER L 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2-49.
- [10] 王其亨. 风水理论研究. 天津大学出版社, 天津, 1992: 15-38.
- [11] 王其亨. 清代皇家园林舆图学研究. 建筑学报, 2005, 52(8): 66-71.
- [12] HEIDEGGER M.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HOFSTADTER 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143-161.
- [13] BACHELARD G. The Poetics of Space. JOLAS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3-16.
- [14] NORBERG-SCHULZ C.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1980: 5-18.
- [15] NAESS A.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Inquiry, 1973, 16(1): 95-100.
- [16] 余谋昌. 生态哲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安, 2000.
- [17] 刘敦桢. 中国住宅概说.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 1990: 112-135.
- [18] 张仲一. 徽州明代住宅. 建筑工程出版社, 北京, 1957.
- [19] 程极悦. 徽派建筑技艺传承研究. 建筑学报, 2012, 57(3): 88-93.
- [20] 单军. 徽州古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城市规划, 2008, 32(5): 45-51.
- [21] 阮仪三. 江南古镇保护与开发.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10.
- [22] 陆林, 凌善金, 焦华富, 等.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及其机理. 地理研究, 2004, 23(1): 87-95.
- [23] 柳肃. 湘西民居建筑形态研究.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 78-85.
- [24] FRAMPTON K.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4th ed.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20: 314-327.
- [25] 李砚祖. 装饰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1993: 156-168.
- [26] 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 李幼蒸,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1999: 48-62.
- [27] 潘谷西. 中国建筑史. 6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 2009: 245-250.

- [28] 田自秉. 中国纹样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2003: 312-318.
- [29] 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89-201.
- [30] POLANYI M. *The Tacit Dim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4-25.
- [31] 常青. 建筑人类学视角下的传统营造技艺传承. *建筑学报*, 2015, 60(9): 1-7.
- [32] 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王才勇, 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56-72.
- [33] APPADURAI A.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康敏, 译. 新华出版社, 北京, 2016: 15-38.
- [34] FORRESTER J. *Industrial Dynam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1: 78-95.
- [35]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4: 1-23.
- [36] FORRESTER J W. *Industrial Dynamics: A Major Breakthrough for Decision Maker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58, 36(4): 37-66.
- [37]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2002: 68-89.
- [38] 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 张逸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 2013: 5-23.
- [39] 宗白华. 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1981: 23-45.
- [40] SPIVAK G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NELSON C, GROSSBERG L.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271-313.